

经典洛阳

【洛阳古代典籍·名人名著⑰】

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,其中不少与洛阳相关;或由洛阳人所著,或所述为洛阳事,或成书于洛阳……在那些发黄的纸张背后,闪耀的都是智慧的光芒。在本系列中,我们选取部分古籍,看看它们当年的模样。

《资治通鉴》:贯通古今的治世教材

□记者 张广英

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。圣人之虑远,故能谨其微而治之;众人之识近,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,则用力寡而功多;救其著,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

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

知善而不能行,知恶而不能去,人主之深戒也。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

司马光洛阳著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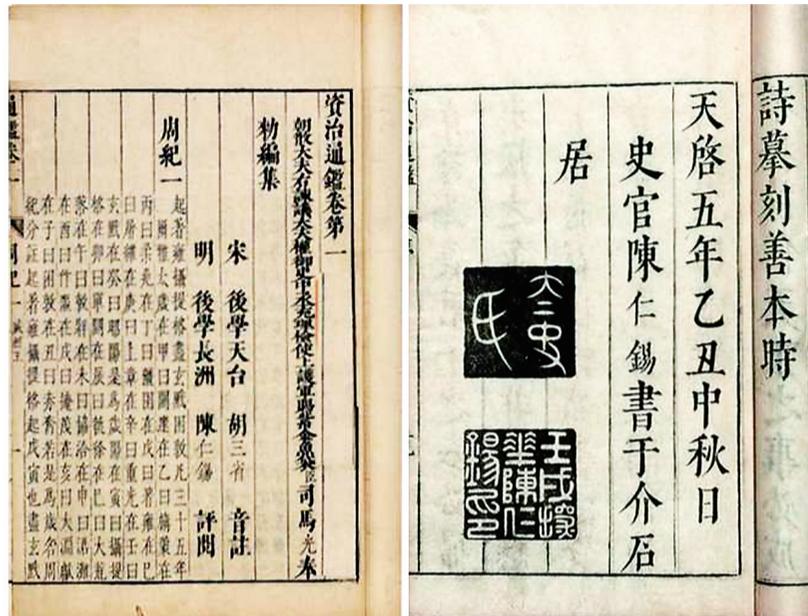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史学界,《资治通鉴》是堪与《史记》媲美的不朽名著,司马光也因此与司马迁一起,被誉为“史学两司马”。900多年前,他在洛阳主持编纂了这部编年体通史,以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,被后来的历代君王视为必读“教科书”。

司马光是北宋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人,字君实,生于公元1019年。他自幼勤奋好学,20岁便一举考中进士,从此步入仕途。虽说宦海茫茫、风云难测,但司马光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。他经历了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一向忠直勤恳,深得皇帝赏识。

不过,与学术上的成就相比,司马光在政治上并无太大作为。神宗熙宁二年(公元1069年),朝廷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,遭到朝廷内外许多人的反对,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坚定的保守派,认为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,并写了三封长信,劝告王安石改变主张。而王安石只回了一封400多字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,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。从此,这对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便分道扬镳,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。

公元1071年,新法推行得如火如荼,政治失意的司马光自请离京,退居洛阳,任西京留守御史台。他在龙门山下建起独乐园,15年不问政事,潜心编撰《资治通鉴》。其实,这项工作早在公元1066年就开始了,当时英宗非常重视,还让他挑选助手,建了书局。只不过书局原先设在汴京,现在设到了西京独乐园。

公元1084年,294卷300多万字的《资治通鉴》全部修完,司马光已是风烛残年。此书原名为《通志》,又名《通鉴》,神宗亲自为书写序,并以其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赐名《资治通鉴》。次年神宗病死,哲宗即位,变法失败,司马光重新回朝拜相。他对《资治通鉴》进行了最后校订,又主持废除了新法,公元1086年病逝后,被迫赠为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



白河书斋所藏《资治通鉴》(图由晁会元先生提供)

一部书贯通古今

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,历时19年才编成。全书贯通古今,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,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,共记述了16个朝代1362年的治乱兴衰历史。

当时,著名学者刘攽(bān)、刘恕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,三个人各有分工:刘攽撰写两汉部分,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,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。司马光身为主编,最后总成其书。他亲自校订,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”,以至于“筋骨羸(qú)瘠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,旋踵而忘”,可以说为这部书付

出了全部精力。

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,主要目的是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。这部书选材广泛,除了有依据的正史,还采用了野史杂书320多种。他在书中除了记述各朝治乱之迹,还大量选录前人史论,并以“臣光曰”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,反映自己的政治及历史观点。比如在选用人才上,他认为“德”远比“才”重要:“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”这样的观点对后人很有借鉴意义。

《资治通鉴》被历代君王奉为必读的“教科书”,后世对其评价极高。比

如,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;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上无以事君,下无以治民;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谋身必至于辱先,作事不足以垂后。”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认为:“自有书契以来,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则说: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,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。”

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,《资治通鉴》在中国官修史书中的地位极其重要。人们将它与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相提并论,认为这两部史书是古代之“史家绝笔”。

现存的珍贵版本

洛阳古籍收藏家、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,历代以来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对《资治通鉴》版本的保护都十分重视。此书的早期版本十分珍贵,目前尚有司马光手写原稿一卷存世,堪称国宝。

“这卷司马光手写《资治通鉴》原稿,存计29行460余字。”晁先生说,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是北宋名相,与司马光及其兄长司马旦有书信往来,这卷原稿中的最后一段,就写在范纯仁寄来的书札上。“原札文字已用墨笔抹去,但文字尚可辨认。卷后还有《谢人惠物状》一份,也是司马光手写的。”

相传当年司马光完成《资治通鉴》时,手稿装满两屋,而传世者大概仅此一卷。在这卷原稿中,司马光记

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(公元322年)正月至同年十二月的史实,但与今天的通行本内容有很大不同,因此有学者判断,它应为《通志》草稿或《通鉴》初稿。

“此卷已流传近千年,卷后有宋代任希夷、元代柳贯等多人的题跋,明代时由袁忠彻、项元汴递藏,清初为梁清标所有,后藏入内府,保存至今。”晁先生说,《资治通鉴》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元祐本,如今已不可见。南宋高宗时有余姚重刻本,亦多残缺,其后诸版本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此。

民国时期,北洋政府教育总长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有藏书20余万册,因其中有两部宋元本《资治通鉴音注》,其藏书处即名“双

鉴楼”。“目前,国内《资治通鉴》尚存宋代刻本六部、元代刻本四部,明清时期也有一些著名版本。”晁先生说,白河书斋所藏为明代陈仁锡评天启刻本,可惜不全。

“早期版本大多残缺,不过很珍贵。前几年,我在北京中国古籍书店见到一页南宋版《资治通鉴》,标价一万元,可谓‘一页宋版一两金’了。”他说。

